在香港约会“刁德一”

——听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谈文化交流往事

本报记者 张小兰

马长礼饰演刁德一的舞台造型

凡是看过或听过电影版样板戏《沙家浜》的人，一定忘不了那个很有“神采”的坏人刁德一吧？2009年岁末，记者为了撰写本报“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的专栏文章，到香港采访了在那里定居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样板戏《沙家浜》中刁德一的扮演者马长礼先生。

因为著名文化老人周巍峙先生的力荐，马长礼先生被列入了我们的采访名单。在香港联艺机构董事长李建民先生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马先生在香港的联络方式，采访的地点也定在香港联艺机构的会议室。马先生对香港联艺机构并不陌生，来香港定居之后，他曾多次应邀到由这个公司所经营的香港新光戏院演出，为京剧艺术在香港的传播“老骥伏枥”。

香港：裘盛戎改名“狗”盛戎

马长礼说，他第一次“出国”就是到香港，因为那时的香港还由英国人管辖。他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从香港起步的，他与香港的缘分也是从文化交流开始的。

1956年，年轻的马长礼参加由谭富英、裘盛戎先生领衔的中国民间艺术团，到香港访演。他们先从北京飞到广州，住在广州的爱群大厦，并在这里与广东省军区文工团的演员汇合，再一起出发到香港。那时候，这样的出访艺术团是受到高层格外重视的，周恩来总理特意从北京飞到广州，给艺术团作行前动员讲话。周总理的讲话非常鼓舞人心，使马长礼感到自己是去完成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使命，浑身充满了力量。

首次香港之行给马长礼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他感到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有趣。到了香港以后，艺术团的京剧加歌舞演出大获成功。马长礼记得，一位随团负责报幕的年轻女士会说英语、广东话和普通话，但在香港主要是用英语和广东话。裘盛戎听完她用广东话报幕后一脸困惑，他憋了半天不好意思问，但还是忍不住偷偷问马长礼，他们怎么把我改姓“狗”了呢？马长礼也不明白，就再去问别人，才知道广东话“裘”的发音就是“狗”。此后的好一阵子，裘盛戎被大家戏称为“狗”先生。

中国艺术团在香港大受欢迎，观众们疯狂地为之鼓掌欢呼。夏梦等香港著名艺人纷纷露面，与艺术团进行亲切座谈。演出进行了半个月，香港观众像过年似的连夜排大队买票观看。香港人民对祖国艺术非同寻常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马长礼，也使他对这个城市产生了一定的好感，且最重要的是使他这个从小受苦、自称“解放的戏子”的京剧演员，对京剧艺术的热爱骤然加深了。

后来，马长礼多次到香港演出。每次到香港，他都能深切地感受到香港观众对内地艺术团演出的狂热喜爱。通过几次到香港演出，马长礼对这个城市的理解也逐渐加深。直到现在，他偶尔还会在香港参加一些京剧票友的活动。他认为，香港其实非常需要祖国的艺术滋养，在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繁荣的今天，内地永远不要忽略了与香港特区的文化交流。

漂亮旗袍被雨浇花

1957年，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莫斯科举办，马长礼随以胡耀邦、周巍峙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正、副总团长，周巍峙为中国青年文工团团长的中国艺术团参加该联欢节的演出。大家坐了7天7夜的火车才抵达莫斯科。

马长礼特别难忘在苏联进行的各种艺术观摩活动，那让他很开眼界。他记得中国艺术团组织大家看过苏联对匈牙利的足球比赛，欣赏过乌兰诺娃表演的芭蕾舞等。一次在观看足球比赛前，他见天空阴沉着脸，就嘱咐同行的两位女同志关肃霜和杜近芳带上雨衣，但是她们生怕影响了自己的形象，不约而同地说“不用，不用”。结果比赛刚看到半截，大雨瓢泼而下，两位女演员身上的漂亮旗袍顿时被雨水浇花了，雨水夹杂着被冲掉的颜色顺着旗袍表面往下滴淌。两只“落汤鸡”回到驻地之后，一个劲儿埋怨马长礼不给她俩拿雨具。

那次，马长礼还在苏联参加了戏曲比赛。评委中有中国的京剧大师程砚秋，本来马长礼想唱《文昭关》，但程砚秋对他说：“长礼呀，你不要唱这个戏，这个戏是两个人唱的，你一个人唱，外国人看不明白；而且，外国人的假声唱得极好听，男人唱得简直跟女人一模一样，你唱假声不一定比得上人家。你改个节目吧，不如唱《捉放曹》。”最终，马长礼的《捉放曹》获得了二等奖，李世济也是二等奖，两位雨中的“落汤鸡”女士关肃霜和杜近芳，则双双获得了一等奖。

“马长礼同志还要演刁德一”

1958年，现代戏的热潮到来了。那时，28岁的马长礼出演《智擒惯匪座山雕》（《智取威虎山》的雏形版本）中的杨子荣，剧组昼夜拼搏，6天就排出了这部新戏。第一次演出是在北京的西单剧场，观众非常喜欢这部戏，马长礼等演员谢幕7次，观众还是恋恋不舍地不肯退场。

这一年，马长礼开始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唱戏，开始的时候与马连良、裘盛戎等老先生一起去。那次马长礼正在化妆，身后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人，看着特别眼熟，他定睛一看，是敬爱的周总理，急忙站起来说“总理你好”。总理说：“我来看看你，你坐下化妆吧。”马长礼说：“谢谢总理。”总理问：“你准备唱什么戏呀？”马长礼回答说：“唱《贺后骂殿》。”一会儿，刘少奇主席也来了，刘主席还围着一个围脖。马长礼说：“刘主席你好！”刘少奇说：“你化妆，你化妆，你的戏唱得很好呀。”化好了妆，马长礼他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问和马长礼一起去的杜近芳：“你挣多少薪金呢？”杜近芳说：“我比您挣得多。”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说：“应该的，你们比我辛苦嘛。”主席给马长礼递烟，马长礼忙说“不会”，主席又爽朗地笑了，说：“不会好呀！”后来汪东兴对马长礼说，以后你们年轻的来就可以了，不要让你们的老师们亲自来了。他们来，毛主席还得对他们特别礼遇，他们每段唱完了，主席都要站起来跟他们握手，唱一次站起来一次。马长礼是马连良的义子，又拜了谭富英为师，主席对老师们和他的尊重，让马长礼非常感动。

考虑到汪东兴的建议，马长礼演了《文昭关》和《借东风》。毛主席一边看戏一边打拍子，还跟着唱。由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毛主席，马长礼内心特别激动，只顾看毛主席，竟忘了台词。毛主席笑着说：“你唱掉了词。”从中南海演出回来之后，剧团的领导找马长礼谈话：“你都给主席唱什么了？”马长礼吓了一跳，以为犯了什么错误，忙问：“我唱的是《文昭关》呀，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领导说：“主席对你上次唱的戏非常喜欢，说下次让你还唱这个（戏）。”

1966年，马长礼参加了电影《沙家浜》的拍摄。后来“文革”开始，要清理阶级队伍，马长礼的妻子小王玉蓉被诬陷为反革命，被抓了起来。“反革命家属”马长礼也受到牵连而靠边站，并被造反派打聋了右耳（后来，由于受到右耳的影响，他的左耳也慢慢聋了），并被贬成剧团传达室的看门工。一天傍晚，军代表叫马长礼跟他走一趟，马长礼以为这是轮到抓自己走了，就对孩子们说：“我走了，如果回不来了，家里没吃的、没钱的时候，就去找你们的伯伯（马长礼的哥哥）要。”军代表让他骑上自行车走，马长礼心想：自行车骑去了谁给骑回来呀？他挺舍不得的，就对军代表说，你骑自行车吧，我跟着你跑就行。军代表说，你骑上车子吧，没关系，咱们只是去俱乐部看戏。到了俱乐部一看，演的是京剧《沙家浜》。军代表让马长礼坐在周总理身边，总理对马长礼说：“长礼啊，你好吗？今天这个刁德一演得不错嘛，是不是你教的？”马长礼回答说不是。周总理对剧团的领导说，我看马长礼同志还要演刁德一嘛。临走的时候，周总理刚上汽车又下来了，对送行的领导强调说，马长礼同志还要演刁德一，连说了三遍。周总理的这句话，改变了马长礼的命运，使得他得以很快重返舞台。

还有一次，朝鲜的二号人物崔庸健访华，马长礼在人民大会堂为朝鲜客人表演《沙家浜》。演出结束之后，周总理让人用大喇叭广播寻找马长礼。找到后，周总理问他：刚才你怎么不谢幕呢？马长礼说：“报告总理，反面人物不让谢幕。”周总理说：“谢幕是演员和观众的关系。”周总理还把马长礼介绍给崔庸健，马长礼的表演得到了朝鲜客人的连连称赞。此后，反面人物又可以谢幕了。这次演出之后，马长礼应邀随中国艺术团访问朝鲜。他带去了两个戏，分别扮演《智取威虎山》中的少剑波和《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还和金日成主席合影留念。

提到留影，马长礼说，过去家里保存的珍贵历史照片不少，但特别可惜的是，“文革”破四旧，老照片都被销毁了，几乎一张也没有留下。

金日成（左一）在朝鲜接见马长礼（图中与金日成握手者）等中国艺术家。

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

岁月如歌

文化部外联局与本报合办

邮 箱：whbgjb@163.com

电 话：010—59881914 64296360

没有信仰就没有真正意义的生命和国土

李肇星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主席台上，我左边坐着拥有许多年轻“粉丝”的滑冰名将杨扬，右边坐着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我忽然莫名其妙地想起小说家马克·吐温与相对论创始人爱因斯坦（我北大的老师周培源副校长曾是他的学生）的故事。有人说，爱因斯坦真了不起，世界上没几个人能够读懂他的理论；有人说，吐温才了不起，人人都喜欢他的幽默……

趁着开会的铃声还未响起，我对杨扬说，我大学一年级在未名湖上过滑冰课，课后还花5分钱租一小时冰鞋在北海练过一次；上大二时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吃不太饱，体育课停了，现在再学滑冰晚不晚？杨答，有点晚，但可以学学打冰壶球，加拿大打冰壶球的人有的已年过九十。说完，她送了我一副温哥华冬奥会冰上运动员特制手套。我大受鼓舞。接着，我扭头向李慎明博导请教国际上社会科学的动态。他表达了对党的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谈了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看法，意犹未尽，顺手赠了我一本《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

我当晚在人大山东团驻地开始如饥似渴地读慎明同志这部新作，边读边浮想联翩，不知黎明将至。

书从苏联的巨变和西方也希望和平演变中国写起，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指出执政党要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认为理论无国界，但好的理论必须立足国情，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该书花了很长的篇幅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这正是我近十年来时常思索的难题。作者针对现实，摆史实，讲道理，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复杂，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位领导人，要从信仰上、体制上找病根；也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外因，毕竟内因是变化的根本。我在外交部期间，曾利用工作之便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了不少于30种回答，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民族不平等、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国争霸失利等。有的回答具体而微妙，说只因苏联不像中国那样有邓小平。一位多次访问苏联的美国前国务卿还说，苏联聪明的官员不比美国少，但前苏共领导人拥有的超豪华轿车和别墅比美国总统多……我觉得，这本书给出的回答涵盖了所有以上内容，并且做了认真梳理。

书中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动力。信仰不是说教。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依然自觉自愿、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才叫信仰。马克思本人就是榜样。他两次拒绝德国当局的高官引诱，长期忍受贫困的生活，3个孩子死于贫病，写《资本论》得到的稿酬勉强够买烟抽……

书中指出，共产党员得讲质量。我一下子想起来，去年参加全国人大与俄罗斯杜马的交流活动时，一位前苏共党员心情沉重地私下告诉我：苏共在有约35万名党员的时候夺得政权，有约550万名党员时打败希特勒，有近2000万党员时丧失政权……好像美国诗人惠特曼也说过，没有信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和国土。

书中强调，理论必须落实到执政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中。我想起党校老师20年前就引用过的经典名句：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书中强调，我们的理想远大美好，但前面的困难和挑战很多，必须以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为明镜，与时俱进地加强党的建设。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要坚定信念，拒绝各种内外诱惑，防止腐败，真为老百姓做好事和实事。有群众支持就能战无不胜。

书中还用列宁的话劝大家：“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记得60年前我刚上小学时，教语文和算术的刘凤楼老师、张敦兰老师也不约而同地讲过这句话。真惭愧，入了党，当了干部，却较少重温这句话了。其实，责任越大，就越需要学习。实际工作的规律是，老师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领导好好学习，群众奋发有为。我高兴，读这本书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好学一点。

这次人大会议开了9天半。我夜夜翻这本书，但读得慢，想得多。我还打电话给我在南开大学带的博士生推荐了这本书，他是党员，四川乡下人，学风较朴实。读这种专著，不像看电视连续剧那么轻松，但的确是一种“被解惑释疑”的享受。我会再读好多遍我在书中划了“道道杠杠”的段落，同时盼着将来能有一种二三百页的简写本问世。因为现在这部书共491页，而且对老年读者来讲字体较小。

“合唱奥林匹克”创始人到中国

本报记者 翟 群

3月17日下午，北京171中学金帆合唱团的团员们早早在排练厅列队准备，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世界合唱比赛组委会主席冈特·铁驰。将这位年过花甲、睿智健朗的德国老人和这群中国孩子联系起来的是今年7月将在绍兴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合唱比赛。作为北京市一支著名的童声合唱团，金帆合唱团将参加此次比赛。如约而至的冈特·铁驰饶有兴致地欣赏了金帆合唱团的演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46年出生于德国海登皮尔志的冈特·铁驰，大学的主攻专业是税务，毕业后从事了多年税务顾问工作。这期间，合唱音乐一直是他不离不弃的业余爱好。1988年，冈特·铁驰最终决定将这一爱好作为终身从事的事业，建立了公益性协会——德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开始致力于组织国际音乐节和合唱比赛。

1988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合唱比赛，成为冈特·铁驰组织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起点。“合唱本来就是一种融入性的活动，为什么不可以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举办合唱活动呢？参加合唱比赛的人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文化，但是在短短的几天里，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互相理解、互相激励。”冈特·铁驰说。

冈特·铁驰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将古老的奥林匹克精神成功地运用在合唱艺术活动之中，创立了“合唱奥林匹克”，即世界合唱比赛。2000年在奥地利林茨举行的合唱奥林匹克比赛是合唱奥林匹克运动的源头，之后，2002年（韩国釜山）、2004年（德国不来梅）、2006年（中国厦门）和2008年（奥地利格拉茨）世界合唱比赛相继成功举办。迄今已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4300支合唱队、20万名合唱队员参加了比赛，其中半数以上的参赛者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音乐与体育一样，参与就是最大的成就。这就是我们所要坚持的奥林匹克精神。我们最重要的口号是，欢迎更多人来参与活动，不分国家、种族，从7岁到80岁、从3人到上百人的合唱团都可以报名参赛。”

冈特·铁驰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加到合唱组织里，因为通过在一起唱歌，可以认识朋友，可以学习语言，可以学习尊重别人，培养集体意识。“这几年来组织合唱比赛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很多年轻人都渴望去了解别的国家、别的国家的人民。从这种意义上说，合唱比赛对于世界文化交流与和平有着自己的贡献。”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我的非洲故事”征文

文化部外联局与本报合办

邮 箱：whbgjb@163.com

电 话：010-64296360

我竟然坐了一天伊斯兰女士专用车

吴志伟

埃及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原因是这里好像什么东西都有一段悠久深厚的历史。

扎格卢勒广场是埃及亚历山大城最大的广场，这里有电车通往西边的盖特贝城堡和东部地区。我愿意乘坐亚历山大的有轨电车，尽管很多人都喜欢在人潮汹涌的街道徒步穿行。亚历山大的电车有着浓郁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风味，令人的思维可以自由飞翔。电车开动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感觉到街道两边的古老店铺在慢慢消失，如同时间消逝的感觉一样。这是一种情结，无关交通工具的选择。

我整天坐着电车畅游，乐此不疲。但是有一天，当我坐在车里时，一直感到非常纳闷：为什么所有上车的都是女人？为什么她们总是对着我诡异地笑？

到达终点站的时候，司机阿拉伯大叔问我：“你要去哪儿？这里已经是终点站了。”我回答说：“我只是想坐电车——我觉得亚力士（亚历山大人对自己的城市的昵称）的电车很有意思。一路过来，景色也非常美丽，我很享受在车上的乐趣。”这时，知道我是中国人的电车售票员走过来与我聊天，谈论起成龙的功夫电影。我想，成龙已经让埃及人民以为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了吧！

当我问起这辆电车上女人为什么那么多的时候，电车售票员的脸笑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他说：“你上了女士专用车厢，另一个车厢才是专门给男人用的……”原来，我竟然坐在女士专用的那节车厢！我几乎忘记了亚历山大是个穆斯林城市了——尽管这里的文化已经非常包容，但穆斯林的一些基本规矩还是要遵守的。比如，男女要严格分离，在电车上也不例外。

我很尴尬，我想我的脸当时一定很像苦瓜：“啊？很抱歉！那么，我该下车到另外一个车厢去。”然而说话间，司机已经给我端来了一杯埃及红茶，还用手按住我的肩膀：“You are welcome!”（在这里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可能他的意思是不用下车吧）我感激地不断说着“舒克兰”（阿拉伯语的谢谢），然后喝了一口红茶——茶非常浓，放了很多糖，巨甜无比。

回程的时候我依然坐在原来的车厢以及原来的位置，这回，由于男售票员的解释，有一些大胆的女士开始和我交谈。到后来，一个带着两个姑娘的中年妇女竟然抓住我的左手，拼命问我为什么我的手指上没有戒指。难道，她很关心我是否单身？

让歌声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

本报讯 （记者张小兰）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一台由全国绿化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中文化产业交流促进会、中央歌剧院联合主办的大型生态环保公益晚会——《绿色畅想》，将于4月2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激昂唱响，该晚会将跨界整合各方资源，共同为世界环保发出呐喊，敦促人们为保护地球、恢复生态、发展低碳经济和力行低碳生活付出自己的行动。

据中央歌剧院院长俞峰介绍，该院为这台关乎国际环保主题的公益晚会做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整场晚会艺术创意巧妙，著名歌唱家云集，旨在用歌声唤起人们对世界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晚会将分为四个篇章：第一篇《美丽的大自然》，用西方古典音乐和合唱的形式，演绎美丽的大自然图景；第二篇《美丽的家园——我的中国》，用中国古典音乐和歌曲，诠释地球与我国、国家与家庭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三篇《拯救地球，救救我们》，用交响乐展现地球面临的生态危机；第四篇《蓝色星球，绿色春天》，用歌曲呼唤绿色，呼唤春天。

负责承办此次活动的中美燕信文化交流（北京）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这台晚会是用文艺的形式为环保助力的一次尝试，该公司将组织这台节目到国内外巡演，唤起更多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人民对环保的关心和支持。